

《贵阳文史资料选辑》第十六辑

目 录

- 抗战期间各方知名人士话贵阳……………宋洪宪(1)
- 我在贵阳的三次警护工作……………卓建安(30)
- 一四〇师参加台儿庄战役前后……………李祖明(39)
- 贵州几个抗日组织简况……………张运昌(50)
- 记国立贵州大学战地服务团……………欧阳震(56)
- 抗战期间三青团在贵州的一些活动……………钱安毅(60)
- ※ ※ ※
- 抗日战争中与革命人士的交往……………张少正(66)
- 沦陷区见闻……………奚长年(79)
- 八年抗战中经历的鳞爪……………汪长锐(84)
- 抗战时期贵阳见闻鳞爪……………费良才(89)
- 一件飞机失事惨案……………蓝 奇(93)
- ※ ※ ※
- 抗日战争时期贵阳女中在花溪石头村……………贾仁华(96)
- 抗战时期的贵阳歌咏活动……………魏 岩(105)
- 抗战时期贵阳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……………钱安毅(109)

抗战期间本省推行国民教育及社会教育简介…李家溱(121)

教育部战区教师服务团贵阳登记处概况……连 青(126)

※ ※ ※

抗战时期的贵阳电厂……奚长年 李协恒(129)

抗战期间贵阳城区的道桥工程建设……金通一(137)

※ ※ ※

抗日时期的贵阳市国民兵团……刘焕立(143)

抗战时期贵州省公务员军训概况……袁树三(148)

贵州贵兴师管区的组织与活动概况……彭国桢(151)

扎佐演习场创建始末……陈廷镇(155)

防空学校在贵阳……汪 坚(159)

“黔南事变”前后炮校动向简记……肖 笠(164)

附后:

关于征集编印贵阳人物资料的安排意见……(167)

《贵阳文史资料选辑》一至十五辑目录……(171)

抗战期间各方知名人士话贵阳

宋 洪 案

茅盾笔下的贵阳中华路

一九四二年春，茅盾路过贵阳，写下《贵阳巡礼》一文，记述了他在贵阳中华路上的一些见闻。

他在来贵阳之前，早就风闻贵阳的一些情况：“贵阳是出人意外的小，只有一条街，货物缺乏，……不过是江南的一小镇罢了！”但当他身临其境，发现这座城市和想象中的不一致。中华南路盖起了三层四层的洋房。门面上大多是“艺术化”了的。“电影院内都虽然不够讲究，但那门面堪称一句‘富丽堂皇’，特别是装饰在大门上的百数盏电灯，替贵阳的夜市生色不少”。另外，象巴黎、六国等大牌号的旅馆，擦皮鞋公司等等，装点了抗战时期贵阳的街市，他很幽默地写道：贵阳比较先前，从表面看来，“出落得更加时髦了”。

然而，贵阳的时髦，不过是表面。茅盾在文章中很遗憾的写道：在贵阳“要什么，有什么”的表面现象下，缺乏的是“精神粮食”。贵阳是旧中国落后的城市之一，在贵阳街头，几乎看不见本地商品，而充斥店铺的是从苏、浙、沪、“远征”而来的东西。他还记述了贵阳的“食盐官销处”，不断地

随意抬高盐价，官价每市斤在两天之内由一元四角涨到一元八角七分（法币）。在中华路上出售着一种“雄精器皿”的商品，可不是在店家窗面里，而是摆设在人行道旁的地摊上。这种用雄黄矿为原料，雕刻成“佛像、鱼鸟、如意等玩意的手工艺品”。它本身是一种艺术品，但贩卖这种商品的人，把它当做能“轻身避邪，安胎保产，女转男胎”等具有迷信色彩的信物来欺哄人民。文中还对竖立在市中心的周西成铜像发表了一些议论。他愤怒地写道：“铜像台四周的街道显然吃过炸弹，至今犹见断垣败壁”。

茅盾对贵阳中华路的这些记录，充分反映了在抗战中国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旧贵阳的真实情况。

本文引文见：茅盾《见闻杂记·贵阳巡礼》

闻一多在贵州留下的足迹

闻一多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、学者和民主战士。

一九三八年二月，迁到湖南长沙的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“临时大学”，决定由长沙再迁云南昆明，校本部和大部分师生乘车先行。留下部分学生组成“湘黔滇旅行团”，准备徒步跨湖南、贵州而往昆明。当时在“临大”任教的闻一多先生，选择了和“旅行团”一起徒步去昆明这条艰苦的道路。

旅行团于三月中旬从湖南湘西进入贵州。在巍峨峥嵘的黔道上，闻一多和学生们一道风餐露宿，体察民情，并饱览贵州的秀丽的山岭。他们对国民党统制下的“贫困不堪”的贵州农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。一路上，闻先生挥动他的彩

笔，画下了近百幅贵州山河和风土人情的速写。这些画中，有《重安江链子桥》、《炉山县小学》、《金凤山》、《贵阳一角》、《甲秀楼》、《黔灵山》《清镇东山小庙》等等。他还引导学生们的进行采风活动，大量收集民歌民谣整理成篇，为贵州人民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。

闻一多和旅行团到达贵阳后，受到了贵阳人民和他们曾熟识的教育界、文艺界朋友们的热烈欢迎。当时在贵阳从事教育工作的李独清先生，邀请闻一多至家中盛情款待，并结伴游览了贵阳名胜黔灵山弘福寺。闻一多还拟探视早年的朋友蹇先艾。可是蹇当时在遵义，未能如愿。

过了几天，闻一多一行告别贵阳继续西行。在往安顺途中，旅行团走的道路“好多是三年前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地方。”在闻一多心目中，贵州“在山多人稀地薄之处，民风很纯朴。”而当地朴质的农民，也“因为这些人（指旅行团）说话温文尔雅，买卖公平，也敢于接近”。他们经常指着墙上依稀可辨的红军标语，给闻一多一行“讲红军传奇式的故事，讲红军战士开仓济贫，关心人民的事迹。”他对此十分感兴趣。有一次，旅行团在一块地主墓地的碑亭下休息，碑上刻有“万古流芳”四个字。正巧几个农民也在这里休息，“学生们要求他们讲红军的故事”一位老农对学生们说：“我见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，都穿着和红军战士一样的军装，说话非常和气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毛主席还到过我们家呢！”老农十分懊悔当时没有送自己的儿子随红军北上，以至现在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。闻一多把老农的好恶两相对照，深有感触地指着墓碑上的字对学生们说：“这座碑是为墓中人歌功颂德的，但这些坟墓文字，我们都看够了，没

有人会相信。我们刚才听到的话，却是一种形式的碑，就是所谓“口碑”。他又指着国民党“围剿”红军时留下的反动标语，愤愤地说：“这是蒋介石祸国殃民的铁证呀”！他的话，表达了鲜明的爱憎立场。

旅行团于四月中旬离开贵州后，不久即到昆明复课。是年暑假期间，闻一多应当时贵州省教育厅讲习会的邀请，放弃休息，二次来到贵阳讲学。这个讲习会在贵阳高中举行（即今贵阳一中），闻主讲的内容是《诗经》。他的讲课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。

闻一多先生在贵州的言行，充分说明了他对党、对人民领袖、对贵州人民的热爱，也说明了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憎恶、唾弃。

本文引文出自：①蹇先艾《忆闻一多同志》

②陈登忆《回忆闻一多师在湘黔滇路上》

田汉在贵州的革命文艺活动

一九四四年秋，日本侵略者将魔爪继续伸向中国西南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寓居在桂林的田汉同四维儿童剧团一起，跋山涉水，“辗转各地，出桂林，经独山，过都匀，走贵阳”。十二月下旬，田汉一行抵达贵阳，住进旧贵州日报社内，田汉在为时三月的艰苦逃难生活中，没有露出丝毫的消沉情绪。在贵阳数月的生活中，他又抓紧时间，组织人们为抗日宣传出力。一九四五年初，贵阳人民时常可以在街头巷尾看见田汉忙碌的身影。为了宣传抗战，田汉亲自辅导四维儿童剧团排演他的剧作《江汉渔歌》、《新雁门关》、《双忠记》

《武松与潘金莲》。这些剧作饱含着浓厚的爱国意识，是很好的抗日宣传剧目。在田汉的领导下，四维儿童剧团的青少年们参加了贵州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办的“十万双布鞋劳军义演”、“救济留筑难童义演”、“慰问抗日将士募捐演出”等等演出活动。在演出中，他时常亲自到台前报幕，感情充沛地向观众讲解剧情，极大地感染了贵阳观众。

在贵阳期间，田汉还“参加了文化人救济工作。向各界募捐，解决中国剧社和四维儿童剧团的生活问题”。在这些活动的间隙时间，他还深入贵阳各剧院，了解戏剧界情况。当他发现贵阳戏剧界的一些问题后，立即在一次文化界人士聚会中，作了关于旧剧改革的讲演。田汉批评了贵阳某些剧团在抗战期间演出《四郎探母》、《红鬃烈马》等“有其背悖民族意识之处”的戏剧。并针对贵阳戏剧界存在的戏剧不为抗战服务的现状，并指出戏剧改革的方向，即“旧瓶装新酒”。他的这些见解，推动了旧贵阳的戏剧改革。

在贵阳期间，田汉和朋友们得悉了日寇前锋已“抵贵州独山”的消息。同许多文化人一起，逃难去到黔北遵义。他应邀参加了全国各地流转到遵义的文学界人士，为遵义市民和学生举办的“文学讲座会”，向人们讲授戏剧知识，当时的遵义还没有扩音器。但田老主讲时，秩序井然，每人都屏声静气的听讲，那种动人的情景，真使人感动。

在遵义期间，田汉还见到了许多逃难到这里的文坛故交。大家于离乱中相见，相互间都有一种难言之感。但田汉仍经常勉励大家，应当看到人民的力量，看到抗日必胜的前景，坚定为抗战服务的信心。

待前线战事稍稍平定，田汉和夫人安娥才随着难民们又

返回贵阳。此后，田汉在贵阳又逗留了一段时间，于一九四五年三月，率四维儿童剧团离开贵阳往云南。

田汉在贵州的革命文艺活动，深深留藏在贵州人民的记忆中。

引文出处：①《戏剧研究》第七辑、邓兴器《田汉戏剧活动与创作年谱》

②1945年1月27日、2月4日《贵州日报》、1945年1月23日《贵州日报》
《田汉畅谈旧瓶装新酒》

贵州籍作家谢六逸在贵阳

贵州籍的现代作家谢六逸教授，于二十年代中叶，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。他曾翻译出《西洋小说发达史》、《日本文学》、《日本文学史》、《德俄西冒险记》、《文艺思潮史》、《欧美文学史略》等几十种外国文学史传记和名著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。

在上海期间，谢六逸曾在复旦大学担任教职，并主编过《儿童文学》、《时报·小春秋》福刊、《文学旬刊》和《国民周报》等。这些工作，使他接触到大量的现代文学作家，与郭沫若、茅盾、叶圣陶、赵景深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谢六逸带着妻儿经香港辗转回到故乡贵阳。在桑梓，谢六逸没有因为生活艰难而消沉。他同现代作家蹇先艾、齐同（高滔）、李青崖等一起创办了“每周文

艺社”，以《每周文艺》这块阵地宣传抗战。他还在百忙中主编了另一抗战刊物《抗建文艺》半月刊。贵阳文通书局也慕名邀请谢六逸主编《文讯》月刊。在这些刊物上，谢六逸创作和编辑出为数不少的好作品，为祖国神圣的抗日战争贡献了力量，他在贵阳的文学活动，得到了贵阳人民和省内外作家朋友们的称赞。

但是，处于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战时大后方的贵阳，随着战争的延续持久，人民生活变得越愈窘迫。面对国统区黑暗现实，人们对抗目前途也越愈心灰意冷。在米珠薪桂的困难生活中，谢六逸不得不担负更多的工作来撑持一大家人的生计。这位乐观的文学家，在黑暗现实的重压下，逐渐变得消沉起来。正如茅盾在一九四二年到贵阳时所看见的：“乍一见面，我就觉得这位老朋友‘搁浅’在贵阳的六七年间，实在弄得身心交瘁了。”^①。苦难的生活使谢六逸说话更少，与茅盾谈话时“眉宇之间那股消沉抑悒之态，却不时流露于不知不觉。”叶圣陶在此时间到贵阳时，探望过谢六逸，给叶圣陶留下了“比以前消瘦多矣”，更加少言寡语，对一切都似乎丧失信心的印象。正是在生计日见拮据使下，谢六逸终于病倒，在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夕，因劳累过度和思想的忧郁下于贵阳师范学院溘然辞世。

谢六逸逝世之后，一九四五年——一九四七年间郭沫若、茅盾、叶圣陶、赵景深、辜锡琛、顾仲彝、曹聚仁、郑振铎、徐调孚等纷纷撰写怀念诗文，表达他们对这位于中国新文学有杰出贡献的文学家的敬意。一九四七年，由诗人臧克家主编的《文讯》月刊七卷三期便是《纪念谢六逸先生专辑》。在众多的悼念诗文中，叶圣陶的挽诗，是对谢六逸

先生一生成就，处事做人，以及谢六逸先生逝世后人们对他怀念的感情的最好概括：

交游百辈春江畔，
玉树堂前推谢公，
谈说从容抽妙绪？
教人宛觉坐春风；

战中朋好各西迁，
公返珂乡我入川，
一遇黔灵憔悴甚，
最伤此别判人天。

本文引文：茅盾《忆谢六逸》《悼六逸》；蹇先艾：《一个不应该忘记的人》；龙炳成：《现代作家谢六逸》；李独清：《回忆谢六逸》；叶圣陶《蓉桂之旅》。

在湘桂大溃退中的丰子恺

一九四四年秋天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最后的一次大战役——“打通大陆交通线”的战争开始时，丰子恺先生正在内迁到广西宾阳附近的宜山浙江大学任教。得悉战事消息，他立刻将家中老弱送到距宜山百余里的思恩县学生家中暂避；自己和大一点的几个孩子则留校观看局势变化。但坏消息仍不断传来：桂林已经沦陷，柳州又处于危急之中。自南线打来的鬼子兵，登陆后很快占领了南宁。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，丰子恺和孩子们都“忧心忡忡，计划逃难。”可是交通工具缺乏，幸而一位朋友反复奔走之后，同丰子恺一家合租到

一辆往贵州都匀的汽车。欣喜之余，丰子恺打电话通知在思恩的家眷，叫她们先到得胜车站，等车过时同往贵州。但没有料到，那位司机从他们手里诈去一百元定钱之后，汽车却始终未来带走他们。

尽管是这样，“难”却是不能不逃的。为路途方便计，丰子恺先打发走身边几个可以独立活动的孩子，和他们相约在都匀见面，然后历尽辛苦，从宜山步行往得胜，接到了岳母、姊姊、妻子和两个十岁上下的孩子。他托几位浙大学生先带走了姊姊和男小孩，亦相约在都匀见面。然后，自己和留在身边的眷属雇了滑竿、挑夫，走了三天，到达河池。

河池县城的一个旅馆老板路通文墨，知道丰子恺的大名，对他们招待得格外殷勤，还为丰子恺一家想了一条退路，老板对丰子恺说：“我有家在山中，可请先生同去避乱”。但丰子恺惦记着黔桂路上疲于奔命的亲人们，婉言谢绝了老板的盛情，考虑着如何往贵州和亲人相会，但是，又怎样去目的地呢？正当丰子恺一筹莫展之际，一件很有“因缘”的事来到他身边。

丰子恺在河池住了两天，旅馆老板便笑吟吟地拿出一副大红闪金纸，请丰为他写对联。按老板的话说，实在是因慕名而求，可没有乘人之危的意思。这时的丰子恺无论老板怎样说都不考虑，提笔为他写了普通庆寿的八言联句。闪金纸质地坚密，不吸水，老板便在马路边当阳处放一条凳，把对联放在上面晒着。凑巧有一位江苏人名叫赵正民的路过，他认得联上的字迹，便进旅馆来找丰子恺。虽然丰与他素昧平生，见面后倒也谈得十分投契。当赵正民了解到丰子恺目前的困境，便慨然答应应用汽车送丰一家往贵州。

很快，司机找来了，没谈上几句，赵正民从身边拿出一张画纸，请丰子恺为他画画。危难中的艺术家，当然有求必应，为赵“作水墨画一幅”。他后来回忆此时心境，当时作画“这件事我很乐愿，同时又很苦痛。赵君慷慨乐助，救我一家出险，我写一幅画送他留个永念，是很乐愿的。但在作画这件事说，兴到笔落，毫无外力强迫，为作画而作画，这才是艺术品……。”第二天司机与赵正民并未失约，丰子恺和家人终于登车启程。车到贵州都匀后，找齐了离散了十余天的全家十余口人。他们在都匀一家饭店进晚餐，共享着离乱后的天伦之乐……。

丰子恺先生因“艺术”家的名气受到河池旅馆老板的殷勤接待，因书法而遇到热心帮助的赵正民。这一系列过程，按丰子恺一位同事的话说，其所以顺利，就是因了“艺术”的缘故。丰子恺自己也幽默地自认：“我这次逃难，的确是受艺术的帮助。”一个名噪一时的艺术家的逃难尚且如此艰难，可以想见当时千百万普通中国人逃难的悲惨了。

本文引文：①丰子恺《丰子恺散文选集》

②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现代分册。

丰子恺条

肖乾和他的《贵阳书简》

短篇小说集《栗子》、《篱下集》，长篇小说《梦之谷》，以及散文《贵阳书简》等，都是现代作家肖乾的作品。

《贵阳书简》描写的内容却远不止贵阳。如果我们能揭

它同肖乾描写贵州的另一篇散文《湘黔道上》联在一起读，这对于了解贵州的过去，的确是有意义的。

一九三八年武汉三镇沦陷之后，肖乾与现代著名作家杨振生一起从武汉而长沙，过贵州而入云南，作了近四千里的长途“逃难”。《贵阳书简》与《湘黔道上》，就记述了他们过贵州途中有关贵州的“一些见闻”。

他们乘车从湖南晃县进入贵州。“出现在车窗外的，就只是山的瘦骨；土是惨黄的，山是秃的”，荒山“没有人栽种，没有人培植”，“村子是稀少的”。在肖乾眼中“贵州河流太少了，田中灌溉多用一种巨型水车，直径可数丈”。遇阴天，灰重的云彩下，这大水车转动起来，真如一幅荷兰风景画。”当他所乘坐的汽车从苗岭上往下开时，他看见，“果然，我们钻出云头了，我们超越了大地的那层奶油，车轮下是万倾银白的‘云海’。偶尔海里孤岛般地露出几座峰头。”他还观察了贵州当时的民俗；进入贵州、所见“多的是节烈碑”，“有时十几座连接排列”。贵州的女人“凉蓬，小轿下垂搭着的似是三寸金莲。这真使我们对内地文化不知如何估量。”

在战乱年代，贵州道上一派混乱景象，翻车阻路，层层关卡，地痞一般的护路队，令人哭笑不得的“盘问”搜查。这些，给肖乾留下了十分不愉快的印象。

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，肖乾在这篇不算太长的散文中，表现了他对贵州人民的关心与赞扬；以及对统治阶级的轻蔑与憎恨。他写道：贵州的山，多是“万倾枯草”，“然而贵阳近郊的模范林场的树苗却茂盛异常；可知贵州的土壤和树木本非冤家”。“沿途名洞古刹的左近”，“也常有些绿树，

但与民生无关”。他发现，“所有坐公路车的人”，俯视蜿蜒东西的公路，在担心个人安全之余，都不能不连声赞叹黔省民力的伟大，能征服这样险阻的高山，那股力量无论放在什么上面，也是不可轻视的了。

肖乾回忆起车出玉屏县时的情况：山路变成了“带子”，“到了盘山，车有时蛇行，作螺旋形，车呜呜地响，只见那英勇的司机，四肢不息地扭动。然而更英勇的是那看不见的千万只手，用勇敢、灵巧和坚忍铺成了这魔术般的路”。从肖乾这些描写，我们可以体会出作家对人民的无限信赖。

到贵阳之后，肖乾游览了贵阳中华路，在这僻远省区的省城里，他居然高兴地买到了自己的作品《栗子》集。更使他高兴的是，经过长途跋涉之后，贵阳“有电灯、有电话、有洋瓷浴盆，还有离湘境后久违了的绿树木，这简直是太丰富的报偿了”。

晚上，肖乾洗浴完毕，“把疲惫的身子安置在一张铁床上，”盖着暖暖的“丝棉被”。思考着，回想着，次日，写下了他的《贵阳书简》。事隔数年，肖乾仍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，又写下了他的《湘黔道上》。

文中引文均见：《贵阳书简》及《湘黔道上》

吴晓邦在贵州的舞蹈演出

一九四三年秋，为了“开辟新的舞蹈园地”，我国著名的舞蹈艺术家吴晓邦，孳妇将雏，率作曲家陈培勋、学生伍依文、游惠海一行，从广东曲江地区向祖国西南进发。

经过长途跋涉，他们先到战时“文化城”的桂林。在一

个偶然的机会，于一家旅馆里遇到了旧友、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。吴晓邦向欧阳予倩谈起他去西南、西北等地巡回演出的打算。准备到贵州独山、贵阳，四川重庆、成都，然后到陕西西安等五地，目的是向这些地区“散播新舞蹈的种子”。欧阳予倩深知这些地区在国民党统治下十分黑暗，加上交通不便，会碰上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，劝吴晓邦放弃这一打算。但是吴晓邦决心已下，坚持了自己的演出计划。

几天之后，吴晓邦一行告别桂林，来到贵州独山。在独山他遇见了在日本留学的同学、现正从事戏剧工作的韦布。吴晓邦向韦布谈起演出计划，得到了韦的赞同和帮助。经过几天奔波，吴晓邦在城中找到一所大庙，搭起了舞台，又从朋友处借到一架钢琴。很快，演出开始了。首场演出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等十几个节目。每当表演到精采处或幕起幕落之际观众就报以“热烈的鼓掌”。这一切使吴晓邦深受感动。事后，他对朋友说：“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，万想不到在偏僻的城市，我的舞蹈作品，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”。

“使我对这次旅行增添了信心”。

他们在独山逗留了十几天，前后演出三次，次次受到独山群众的热烈欢迎。为了完成旅行演出计划，吴晓邦一行告别热情的独山人民向贵阳进发。

到贵阳后，他们一行生活发生了困难，甚至“没有经济条件去住旅馆”。几个人只得分散找地方住。作曲家陈培勋不喜欢“这种旅行演出的方式”，“担心继续下去，在生活上还会发生更多困难”，辞别吴晓邦先往重庆去了。这突如其来的生活和人事变化，使吴晓邦一度担心他的计划能否实现。但是，当他“一旦想到新舞蹈的种子需要人去传播”，

“就把这种担心忘去了”。

在贵阳，吴晓邦经人介绍认识了贵阳文化馆业余剧团的程默、白浪、沈杰“三位热情的青年”。在他们的帮助下，吴晓邦举办了第一次招待文化界人士的茶会，并在报上发表了演出的“消息和新闻”。这些工作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。当时的市艺术馆馆长支持吴晓邦的演出活动，主动借出文化馆的一间礼堂，临时叫人搭台供吴晓邦演出。他“邀请了当时在广播电台工作的叶宁担任钢琴伴奏”。在贵阳的首场演出节目是：《饥火》、《思凡》、《丑表功》、《游击队员之歌》、《生之哀歌》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迎春》、《奇梦》、《徘徊》、《血债》等。随后，吴晓邦作了多次演出，节目不断变化，备受人们欢迎，也鼓舞了这位舞蹈大师和学生们的信心。

一九四四年一月，吴晓邦一行怀着感激的心情告别贵阳艺术界朋友、贵阳山城热情的人民，踏上了前往重庆等地的新的征途。

吴晓邦解放后总结他在贵州的演出时说：“我的演出，只是因为它的内容接触到某些现实的事，想从生活的侧面刻画了在那个时代中某些人物形象，表达他们的内心世界，就引起了观众的兴趣。社会的评论给了我无限的勇气，使我在生活困难面前树起了磨炼意志的思想。”

引文出处：①吴晓邦《我的舞台艺术生涯·磨炼意志》

②据陈恒安先生回忆

方敬在贵州的文学活动

一九四四年冬，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广西桂林之后，又向贵州进逼。当时身在广西的现代著名诗人方敬，只得带着夫人频伽（何其芳同志的胞妹）和两个孩子，投入“逃难”的滚滚人流，流亡到贵州这片贫瘠落后的土地。

他们先随着难民的队伍经过贵阳逃到遵义，住在友人朱企霞的家里。并同朱企霞“有过一个来月聚首”。在这一个多月里，方敬除了写作一些诗歌、小品外，还参加了当时各地逃难到遵义的“作家、诗人和戏剧家们举办的文学讲座会”。“讲座会”设在遵义老城杨柳街“悦来茶馆”里。方敬在这里多次讲授了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。这时他还看了何其芳由重庆寄给朱企霞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。读后，方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。

一九四四年底，“黔南事变”以日寇退出独山而告结束，贵阳逐渐安定下来。在遵义的“文化人”，包括方敬在内又来到贵阳。经过多方奔走，他得到了贵阳《大刚报》老板的邀请，为《大刚报》编“文学副刊〈阵地〉”。在编《阵地》期间，方敬除自己写作数量较多的文艺作品、随笔、短评外，也向昆明、重庆等地的朋友们约稿，并经常采用贵州文学青年的稿件。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李广田同志，不仅时常来稿支持方敬办副刊，而且也向联大的同事们以及居住在昆明的作家们为方敬组稿，“并主动为编好副刊出主意”。正是在方敬的努力和友人们的支持下，《阵地》才办得有声有色，成为宣传抗日、抵制国民党压制民主、民